

让更多阳光雨露滋润科研幼苗

许秀华

今年两会会场上,创新能力成为热议的话题。与世界其他民族相比,中国人当然不缺创新能力。可为什么创新能力发挥不出来呢?我国已在SCI数据库科技论文数量上居世界第二,年专利申请数居世界第一。但是,我国在重大科学发现和关键核心技术的源头创新上与世界强国相比远远不足。

有人认,中国的教育过于注重知识的系统灌输,而忽视了想象力、创造力的培养。还有人认为,需要对科学家提出道德约束,让他们树立科学精神。但笔者认为,仅仅对科学家提出道德约束是不够的,必须还要从科研制度上做一定的革新。否则,在一个有缺陷的科研体制下,一个科学家自我进行道德约束的结局往往是劣币驱逐良币。人都被踢出局了,何谈科学精神的发扬光大;离开了实验室的硬件

支撑,又怎能验证内心的探索想法?科学研究从来都是一项烧钱的工作。所谓科研体制的改革,归根结底是科研经费的分配问题。即,将科研经费分配给谁?如何确保拿到经费的科学家是有创新精神的?如何切实保证真正从事创新研究的科学家拿到经费?如何做到每个科学家拿到的经费资助与其所从事的科研需要大致匹配,不多也不少?

近年来,我国一直加大科研投入。但是不论投入多少科研经费,科研经费的数额都是一个有限值,都必须直面分大饼的问题。而在这场科研经费争夺战中,青年教师也就是网上调侃的“青椒”,以及刚毕业没几年的博士和博士后们则是永远的弱者。

国家的科研经费向知名科学家,向院士倾斜在一定程度上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凡事

要有度。不管多么伟大的科学家,穷其一生,能做出的值得称道的科学成就都是有限的,毕竟一个人的智力、精力和体力都是有限的。

回顾这些功成名就的科学家个人学术史,我们会发现,他们中大部分人一生中做出的重大成就,基本都萌芽于研究生阶段。如果他们比较幸运,能够及时获得科研经费的资助,那么他们的创新之路就会较为平坦。如果不幸自己的想法没有进入上一级科学家的视野,并且受到认可和鼓励,他们的创新之路就会比较坎坷。

现在科技领域的好苗子在哪里,在做什么?他们出于获取经费以及职称晋升的需要,主动地或者被动地投奔知名科学家,成为几十人甚至上百人的科研团队中的一员,藉此获得知名科学家所分包下来的某个大研

项目的一个局部,从而获得暂时的安身之本。

在资助科学研究时,我们的科研经费管理部门,要做个懂得植物生长规律的园丁,要在植物的抽条分蘖期保证好光气水肥。发掘创新,不是继续大量集中经费于个别知名科学家,指望一棵树直上达天,而是要广泛地培育幼苗,从中不断地筛选出成长势头好的好苗子来,之后再重点加以资助。

提升原始创新能力,要给青年科学家以一定的选择课题的自由度,给予青年科学家以一定的基础科研经费支持,让他们能够自由地开展科学研究。在他们研究生涯的早期,不要过分催促他们发表论文,不要急于让他们做出成果。因为最好吃的大米,一定是生长期比较长的。唯有如此,米粒才会饱满,口感才会香甜。

全面减税不妨先从流转税开始

韩迅雷

近来,各行各业的代表、委员,都在为个人所得“减税”振臂一呼。对于普通大众来讲,个人税负之痛被重视可谓喜事。但在这片光影里,为流转税“减税”的声响就弱了很多。

确保所有行业税负只减不增,这是今年《政府工作报告》作出的承诺。但在笔者看来,开启全面减税之旅,与其从个税开始,不如换成流转税先行。

目前,对于流转税的平叛反应,其实源于人们对于中国税收存在着“两种幻觉”。

幻觉之一,降低个税是一种普惠性的简易做法。在不少人心中,中国有13亿人口。降低个人所得税,就等于为大家增加了纯收入。这种说法很有道理。不过,从减税的人群考虑,个税的影响面还不宽,而且操作起来比较复杂。

目前,在广大的农村地区,很多人还达不到纳税的标准。因此,不管是提升个税起征点,还是房贷利息、教育和抚养子女费用将可减免的新体系,都和相当多人的关联度不大。而在城市里,征税额从3500元升至5000元,少缴的费用数量偏少;而综合全家收支的缴税方法,又因难以考量而具有太多不可操作的因素。

幻觉之二,消费者的税负不重。过去十余年来,我国经济飞速发展,人民生活水平日益提高,加之此前几年的个税改革和农业税取消,让不少人生出新的幻觉:我国消费者税负日渐降低。

由于中国社会对税收常识缺乏全面了解,在这里笔者不妨先解释一下。目前,我国主要有三大税系:流转税、所得税、财产税。其中,我国税收中来自增值税等流转税的占70%以上。相对直接税而言,流转税属于间接税,因流通而生,因流通而增,这也意味着税负在流通中可以转嫁。

在美国等发达国家,以直接税为主,商品中含税很少;一些地区虽收取增值税,但税率普遍不高,欧洲平均为10%,日本为4%;而在我国,增值税要高很多,分成17%和13%两种。

增值税属于流转税,这一部分最终会落在购买者头上。税负高居不下,产品售价增高。中国商品竞争力就会受到影响。于是,一批有钱人到海外购物。而无力到国外消费的,只能默默承受当下的一切。而这些人正是我国最广大的中低收入者。

对比两大税系,走出两种幻觉,笔者认为,相比降低个税,降低流转税更具操作性,也更让更多人特别是中低收入群体受益。当然,流转税是我国的最大的税种,降低之后影响也会较大。为了填平这块洼地,我们应该从平衡角度出发,尝试着增加财产税,比如房产税、资源税等。

在改革进入深水区时,我们希望看到,决策者“不再摸着石头过河”,敢于拿出气魄来,倾听企业和普通人的心声。而这两种声音恰好可以在流转税中汇聚。

净化学术环境 催生更多“屠呦呦”

张楠

今年两会上,一位科学家的名字被正式写入《政府工作报告》,这在以前是极其罕见的。李克强总理在回顾2015年工作特别指出:“我国科技领域一批创新成果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屠呦呦获得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对我国发展取得的成就,全国各族人民倍感振奋和自豪!”两会的代表委员们也纷纷表示,要成为创新型国家,我们需要更多“屠呦呦”!这种期待,更是一种对于科技创新的诉求表达,以及对于创新人才的热烈渴望。

一个国家拥有一、两项诺贝尔级别的科研成果并不能证明其已成为科技强国,但要想跻身科技强国行列,没有诺贝尔奖是断然不行的。这些诺贝尔级别的科研成果的获得,需要那些世界一流的科学家来努力实现,而杰出科技人才的出现则依赖于全社会所营造的良好学术环境。

日本的经验值得借鉴。该国首次摘得诺贝尔物理学奖桂冠的是汤川秀树,他因核作用力的理论为基础预言了介子的存在而荣获1949年度诺贝尔物理学奖,此后又有日本研究人员不断获得诺贝尔奖。日本曾在2001年提出过“五十年三十个诺奖计划”。截至2015年底,含美籍日本科学家在内,已经有16人获得诺贝尔奖,主要集中在物理学、化学、以及生理学或医学奖项。这种井喷现象并不多,在世界范围内相似的情况,也仅仅有美国在1945年之后曾出现过短时期内获奖人数激增的景象。纵观日本21世纪以来获得的诺贝尔奖项,除天体物理学与理论物理之外,其他研究均在生活中得以实际的运用,带来了巨大的经济效益,都为最具代表性的科技创新。

这些不断涌现出诺奖得主的基础研究领域的技能,这样更有利于为成功创业提供条件。(作者系全国政协委员、天津赛恩投资集团董事长)

经有学者提出,中国当前的创新必须回归到原初的理念,即“广义创新”。而实现广义创新的源头在于全社会能否形成良好的学术环境。由于治理学术环境是个世界性的难题,不同的国家在改善本国科研条件、优化人才成长条件时,也是基于不同的历史发展阶段而采取相应的改善措施。这就决定了我们要客观审视当前的科学发展阶段,只有在正确的认知前提下才能作出合理的科学判断。同时,要求我们既不能简单地搞“拿来主义”,也不能一概趋同化、类比化。

良好的学术环境是培养优秀科技人才、激发科技工作者创新活力的重要基础。我认为,当前亟待解决的,就是以优化本国学术环境为根本,从科学文化层面来提升中国科研的“软实力”。国务院办公厅年初发布的《关于优化科研管理环境、营造优良学术生态的若干意见》提出了优化科研管理环境、人才成长环境的任务要求。中国科协党组书记、常务副主席、书记处第一书记丛勇也强调,学术环境质量取决于改革的成效。只有整个学术环境提升上去,才能避免出现学术大师陨落、中国科技至少要倒退20年。”

未来,可以期待通过优化学术环境,将为中国带来更多的“屠呦呦”。诺贝尔奖得主、著名华裔物理学家杨振宁先生也曾指出,中国以科教兴国为国家发展的战略方针,将使中国在21世纪出现更多的一流科学家和人才。中国要出现世界一流的科学家,做出一流的科学研究,需要四个条件:一是人才,二是好的传统,三是决心,四是经济。毫无疑问,目前中国已经逐步具备这些条件。预计在不久的将来,随着中国学术环境的不断优化和改善,在为我们带来更多诺奖得主的同时,也会促进大量优秀的科研人才脱颖而出。(作者系中国科协创新战略研究院副院长)

教授为何“热衷”开会

朱四倍

河南代表团在驻地召开联组会议,河南省委书记郭庚茂和省长谢伏瞻参加会议。中科院院士、清华大学副校长施一公发言称,高校行政化趋势加重,各种会议特别多。

在公众对高校行政化的抨击声中,连大学内部人士也深深感觉“高校行政化趋势加重”,这与前些年仅仅是外界诟病高校行政化形成了尴尬的对比。此前,全国政协委员姜耀东就鲜明指出,“不去行政化,大学就没办法办下去了。”在这样的现实面前,谁能对大学行政化趋势加重无动于衷呢?

大学的官本位趋势对大学气质和学者精神进行了无情的阉割,当教授等科研人员把主要精力放在冗长的行政环节上,要花很长时间去开各种行政会议时,可以想象,我们能期望大学出创新性的重大成果吗?

教授不开会行不行?恐怕也不行,要么会丧失资源分配的资格,要么会被淘汰出局……如此种种,教授也是有苦言难。

大学教授陷入“会海”,在一定意义上,这是当下中国社会的缩影,行政权力而不是学术权力主导大学发展。我国大学的行政化,包括大学外部行政化和内部行政化两种表现。所谓外部行政化就是,高校作为学术性组织的特性在一定程度上被忽视,用行政的手段和管理高校;而内部行政化就是没有按高等教育发展规律、高等学校办学规律和学术发展规律办事的问题。这也是高校教授明知该以教学和科研为主业,甚至为生活的全部,却偏偏把开会当成了“任务”。当然,外部行政化是造成高校内部行政化的主要原因。

那么,大学人可以主动去掉内部行政化吗?客观而言,这是一个难题。可以说,外部管理的行政化困境不消除,单一地消除内部行政化是寸步难行,问题重重。道理很简单,如果教、科、文、卫等部门的行政级别不配套取消,更重要的是如果整个社会的官本位风气不纠正,只简单去掉内部行政化,恐怕是不可能的。如果国家没有整体的关于高等教育去行政化的制度设计和安排,没有配套的、可以落实的各项具体措施,没有破解社会上已形成的官本位社会氛围,高等教育去行政化可能就会成为空中楼阁。所以,高等教育的行政化由来已久甚至积重难返,去行政化也就变成了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了。

当下,尊重教育规律,按照大学的办学特点进行管理,维护良好的大学治理生态,是一种必须,也是防止教授陷入“开会为生”怪圈的必然选择。



打赢脱贫攻坚战

“十三五”规划纲要草案提出,“贯彻精准扶贫、精准脱贫基本方略”“加大扶贫攻坚力度”“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两会上,代表委员们就打赢脱贫攻坚战展开热烈讨论。

全国政协委员王文彪建议把荒漠化地区贫困人口脱贫列入“十三五”脱贫攻坚战的工程,充分发展绿色生态产业、清洁能源,让老百姓获得稳定的治沙收益。这是王文彪委员发言时展示内蒙古库布其沙漠由荒漠变绿洲的卫星遥感图。

新华社记者 马占成摄

“双创红利”落地先要转变价值取向

左晔

投资大咖谈双创

大众创业,万众创新。一股全民创业热潮汹涌而来。但要想确保“双创红利”真正落地,还有一些问题有待解决。

首先要解决的是价值取向问题。在中国文化基因中,人们的价值取向普遍缺乏对创业的认可和对创业英雄的崇敬。尤其是年轻人,对创业往往不屑一顾。在“双创”大潮中,这种局面虽然得到了很大的改善,不过,对于更广泛的年轻人来说,他们似乎更崇拜那些光鲜亮丽的娱乐明星。而且,他们有时候还会沉醉在一些“非主流明星”捧出位、求出名、捞大钱的“成功逻辑”中难以自拔。反观国外的年轻人,他们对乔布斯、比尔·盖茨、扎克伯格等创业明星的崇拜要远胜于娱乐明星。他们认为的成功是通过自己扎扎实实的奋斗去赢得名誉、地位和财富。

另外一种需要改变的价值取向,就是盲

目的“造神运动”。在我们的创业文化中,存在着一种过度包装的倾向。“过五关斩六将”的故事,大家都愿意讲;“走麦城”的惨痛教训,人们都愿意隐藏起来。在铺天盖地的“创业神话”中,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投入到创业中来。不过,他们中间的很多人,其实并没有准备好,而是在一种浮躁氛围的鼓动中草率行事。这样的取向是需要反思和改正的。

每个时代都有每个时代的潮流。当下,新一轮科技革命的浪潮正在袭来。这正是中国转型发展必须要抓住的机遇。所以,这个时候的“双创”,也就具有了更多的意义和价值。我们应该通过教育、舆论引导、媒体宣传为整个社会注入正确的积极的价值取向基因。这时候,我们需要大力弘扬创业精神,树立创业榜样,用激动人心的创业故事引导人们,以创业为荣,并尽可能理性地去创业,争当创业英雄。

在价值取向的转变之外,对于创业本身来说,目前最缺的要素是完善的全产业链金融体

系。如果说,“双创”是创业的一只翅膀的话;那么,完善的全产业链金融体系便是另一只翅膀。二者缺一不可,创业都难以展翅飞翔。目前,虽然新三板在企业融资方面已经做了一些工作,但尚不能满足实际需求。如果跟美国硅谷的金融体系相比,更是相距甚远。因此,我们还需要大力发展VC、PC等各类金融形式,尽早建立完善的全产业链金融体系,为创业提供更加完善的服务。

“双创”的有效落实,还需要加强创业培训辅导,以防止大众创业者四处碰壁。除了加强各类创业机构的培训辅导力度外,在学校教育上也应该重点加强创业引导。从小学到大学,应根据不同年龄段的特点,适当注入创业教育课程。从小培养创业兴趣,形成对创业的正确认识,掌握创业的基本技能,这样更有利于为成功创业提供条件。(作者系全国政协委员、天津赛恩投资集团董事长)



为草根“网创”当好“店小二”

徐迅雷

数字化生存的时代,“数字”往往比人还厉害。2016年3月9日下午,“阿尔法围棋”人机大战,在第一回合,韩国李世石九段完败于“远道而来”的谷歌机器“阿尔法”。人工智能、计算机科学、数字化运用,完全能够让某些领域登顶金字塔塔尖。这就是一种顶级创新。而在金字塔塔基,普通草根同样可以借助网络进行创新创业,在创客云集之地,“你的邻居或许就是下一个马云”。

“构建面向个人的网络创业平台,越来越成为创业阶层创新创业活力的新引擎。”来自浙江的全国政协委员吴晶提出提案,建议在新常态下更好促进草根网络创业;立足新形势,为个人网络创业开辟“新空间”;当好“店小二”,为个人网络创业提供“入场券”;解

决“燃眉急”,为个人网络创业加把“安心锁”。其中特别提到,要“放水养鱼”,给予互联网、电子商务创业税收优惠、减免,降低创新创业的“门槛”;有效助推精准扶贫,探索提供无抵押信用担保的小额贷款等多种金融服务,帮助解决个人创业特别是弱势群体首贷难问题;进一步放宽经营范围,允许在家庭住所等场所进行网上创业。

概而言之,这就是草根“网创”——包含了网络创新和创业的双重含义。网上网下,政府民间,助推“网创”,都需要给力。《杭州日报》日前有个富有趣味的报道——《拎包客:打造有温度的新型创客社区》,说的是梦想小镇旁的“拎包客”创客公寓的故事。梦想小镇,正是以互联网创业为特色的“小镇”,这里

的梦想就是:创造大众创业的无限机会,释放万众创新的无穷创意,构筑创客创客的最大可能。“创客社区”正是为“网创”服务的,不仅满足创业草根的居住需求,还着力搭建一个交流和分享的平台,整合优质资源,帮助孵化创业项目,甚至成立“拎包基金”,在投资上助草根一臂之力。

政协委员的建议,现实“网创”的探索,两者在此结合,共同构筑梦想。马云当初准备借助互联网创业之时,并不知道自己将成为“伟大”可能。“创客社区”正是为“网创”服务的,不仅满足创业草根的居住需求,还着力搭建一个交流和分享的平台,整合优质资源,帮助孵化创业项目,甚至成立“拎包基金”,在投资上助草根一臂之力。

两会上,代表委员们就打赢脱贫攻坚战展开热烈讨论。全国政协委员王文彪建议把荒漠化地区贫困人口脱贫列入“十三五”脱贫攻坚战的工程,充分发展绿色生态产业、清洁能源,让老百姓获得稳定的治沙收益。这是王文彪委员发言时展示内蒙古库布其沙漠由荒漠变绿洲的卫星遥感图。

“双创”的有效落实,还需要加强创业培训辅导,以防止大众创业者四处碰壁。除了加强各类创业机构的培训辅导力度外,在学校教育上也应该重点加强创业引导。从小学到大学,应根据不同年龄段的特点,适当注入创业教育课程。从小培养创业兴趣,形成对创业的正确认识,掌握创业的基本技能,这样更有利于为成功创业提供条件。(作者系全国政协委员、天津赛恩投资集团董事长)

要优化环境,就必然要求删减各种病虫灾害。目前,杭州市正在全面构建新时期电商质量治理新机制,以“大数据”“云计算”支撑电子商务产品质量监管,还将努力推动电子商务质量管理由“中国标准”上升为“世界规范”,目的是带动全球电子商务健康发展。毋庸讳言,当今电商领域消费欺诈、产品质量等问题层出不穷,网购已然成为投诉“集中营”。这背后,出现了许多与草根“网创”相关的问题,比如“刷单”行为,比如“差评师”和“炒信师”问题等等。为此,吴晶委员提出建议,对不正当操作电商信誉的“炒信”行为加强治理;建立网上交易信任体系,健全多元化管控,形成治理合力;尤其是需要创新机制,可借鉴酒店行业的“试睡师”职业模式,由电商协会培训筛选出职业买家“试买师”,专门对电商平台上的店铺、商品进行第三方评价。

两会越来越多地传递出鼓励年轻草根积极创业的信号。我想,只要在现实中实现“创造更好的环境”,那么,草根的“网创”定能够为全社会创造更为生机勃勃的创业活力。



全国政协委员刘晓庄在全国两会上提出,要对“奇葩证明”动真格,对那些“设卡添堵”的单位和公职人员及时曝光严厉查处。同时,打破部门间的信息封闭,开放信息核对接口也很重要。图片来源:CFP